

金庸小说论稿增订版

严家炎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庸小说论稿(增订版)/严家炎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7-301-13149-7

I. 金... II. 严... III. 金庸-侠义小说-文学研究 IV. I207.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1778 号

书 名: 金庸小说论稿(增订版)

著作责任者: 严家炎 著

责任编辑: 张凤珠 艾 英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3149-7/I · 200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16 印张 285 千字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宗素先生尊鑒。陳墨先生所標。余庸說世界此一
文。謬誤殊甚。愧不敢言。其中少教因事集畧有出入。僅
修于奉上。謹將神代錄陳先生所改者均予共鑒。旨不
改也。諸事共公。至以為感。

作相相示日久。不

去期未過。及至其庸先生為師友之前。

而主要係師。恨不解未此下列。先生行據也。今後通函。

此心平輩相結。先生或較年長。志在先生也。另函致

王國著。先生。造者神轉致。日後未示。志造行奉年訪。

一覽。免誤。幸此。即誌。

大書

已
蕭
謹
上

九廿八



目 录

初版序言	(1)
金庸热：一种奇异的阅读现象	(1)
读者数以亿计——持续时间之长——覆盖地域之广—— 读者文化跨度之大——超乎政治分歧之上——中国内地 最早的读者可能是谁——一系列难以索解之谜	
文化生态平衡与武侠小说命运	(5)
评估侠文化问题的两种偏向——侠义行为：必要的社会调 节机制——“五四”文学革命的局限与后来的左倾幼稚 病——文化生态平衡受破坏与侠义精神的失落——武侠 小说性质、功能的辨析——杨沫与鲁迅、老舍、台静农的例 证——旧武侠小说的疾患与金庸等新派武侠小说的功绩	
豪气干云铸侠魂	
——说金庸笔下的“义”	(18)
“义”：侠文化之魂——富有浪漫主义激情的叙事艺术—— 肝胆相照，一诺千金——路见不平，舍身相助——赋予 “义”新的内涵——郭靖、乔峰：“大侠”的典范与“义”的新 提升——金庸状写侠魂的成功经验	
变幻百端笔生花	
——说金庸笔下的“武”	(27)
大有作为的艺术天地——优势在于驰骋想象——武功打 斗的学养化与艺术化——武文相通，悟道为高——武功打	

斗的性格化与趣味化——人物刻画与武功描写相得益彰——武功打斗的情境化与立体化——特定情境中武技、智慧、心态诸因素的综合较量

生死以之痴千态

——说金庸笔下的“情” (40)

小说内容的第三号支柱——金庸式的纯情故事——真爱：不自私，为对方好——形形色色的痴情种——《射雕》：最富青春气息之作——精致不俗的《白马啸西风》——情花的象征意味——李莫愁：可怕又可恨的情痴——皮格马利翁效应——潜文本的形式意义

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 (48)

自觉追求思想性的武侠小说家——否定“快意恩仇”、任性杀戮的观念——小说界以平等开放态度处理中华各族关系的第一人——纠正黑白分明的正邪二分法，以是否“爱护百姓”为新尺度——揭示权力的腐蚀作用——渗透着个性解放与人格独立精神——锐利的针对现实的批判锋芒——用现代心理学观念剖析、塑造人物形象

论金庸小说的情节艺术 (64)

有强大魅力的艺术迷宫——不靠误会取巧，不靠诞妄情节——借用某种模式，又不落入某种模式——善于设置悬念，借转折提出悬念——复式悬念，环环相套——虚虚实实，扑朔迷离——奇峰突转，敢用险笔——出人意外，在人意中——《西游记》和卡夫卡《变形记》的启示

论金庸小说的生活化趋向 (76)

贴近人生，不走捷径——黄蓉、杨过何以如此生动——一个细节写活一个人物——“叫花鸡”的启迪——让人读着都要流口水——高潮正由铺垫而来——曲尽人情世趣，写出日常生活无穷韵味——“疾雷之余，忽见好月”——“闲笔”的妙用

- 论金庸小说的影剧式技巧 (88)
- 早年对影剧的钻研与实践——小说场面舞台化及其四种形态——人人有戏演的两场重头戏——不在场却是真正主人公——舞台的明处与暗处——后台也在演出——叙事语言的具象性与画面化——成套镜头的调配运用——电影特技施之于小说——小说艺术的革新
- 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 (100)
- 一种新见解:金庸对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小说主人公文化程度真的“越来越低”吗?——追求“统系”,致入误区——金庸小说中传统文化由多元构成——郭靖乃儒墨文化共育之身——康熙:兼容儒法的明君——金庸对传统文化既有赞颂又有扬弃——黄药师父女嘲讽了什么?——袁崇焕、顾炎武、黄宗羲的例证——反正统并不等于反传统
- 金庸的“内功”:新文学根柢 (114)
- 阅读中得来的朴素感受——“五四”新文学、西方近代文学对金庸的影响——把性格刻画放到首位,而不是着力编故事——小说结构是西方近代的,而非传统的——语言兼容传统白话与新文学二者之长——努力创造意境的艺术追求——严肃认真、求新求变的创作态度
- 文学的雅俗对峙与金庸的历史地位 (126)
- 雅俗对峙: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20世纪中国小说地位空前变化与鸳鸯蝴蝶派依然受排斥——新文学对通俗小说的影响与通俗小说对新文学的挑战——“一场永远难解难分的拔河比赛”——雅文学、俗文学都能产生伟大作品——超越雅俗:金庸小说的成就与意义——“供消遣”与“为人生”的统一——超凡的天马行空般的想象才能——传统小说语言形式的发扬光大——雅俗共赏的理想境界

金庸与大仲马小说的比较研究	(135)
奇异的“相似”现象——历史“是用来挂我的小说的钉子”——历史框内的“圆”与“方”——《基度山伯爵》与生活原型的复仇故事——金庸小说的复仇观——出色的人物创造与神奇的艺术想象——不自觉的简约化与立体感——侠义小说的不同民族文化韵味	
我看金庸小说(代结语)	
——在中国传媒大学的讲演	(147)

附录一 相关散篇集存

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	
——在查良镛获北京大学名誉教授仪式上的贺辞	(171)
金庸答问录	(175)
《连城诀》简评	(180)
新世纪思想文化之光	
——读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	(183)
金庸笔下的大理	
——1998年4月12日在大理“金庸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188)
2000'北京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闭幕词	(192)

附录二 论争史料存真

以平常心看新武侠	(199)
如果这类逻辑能够成立	
——质疑袁良骏先生对金庸小说的批判	(203)
就《铸剑》与金庸小说再答袁良骏先生	(209)
批评可以编造和说谎吗？	
——对袁良骏先生“公开信”的答复	(216)

也算“立此存照”

——答袁良骏先生《勿误人子弟，毁我文学》一文 (222)

再谈金庸小说与文学革命 (231)

增订版后记 (243)

初版序言

1995年春开始,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程。这部书稿便根据那时的讲稿陆续整理而成。其中部分内容,1994年起曾以学术论文的方式,先后在香港《明报月刊》、岭南学院《现代中文文学评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杂志、武汉《通俗文学评论》、广州《东方文化》杂志、北京《中国文化研究》上刊载。现在集稿出版,又增补了当初为避免论文过长而有意节略的篇幅以及一篇课堂讨论发言选录,文字上也作了些润饰修订。

在大学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平心而言,并非为了赶时髦或要争做“始作俑者”,而是出于文学史研究者的一种历史责任感。早在1980年代初,我就主张现代文学史不应排斥鸳鸯蝴蝶派小说和旧体诗词(见1980年发表的《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一文),并首次将张恨水写入文学史教材。至于金庸这样的杰出作家,当然更应入史并可开设课程。具体来说,我开这课,一是为了回应青年朋友们的殷殷期待,二是为了回答文界个别人士的无端指责。

钱理群教授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他读金庸小说的缘由:

说起来我对金庸的“阅读”是相当被动的,可以说是学生影响的结果。那时我正在给1981届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讲“中国现代文学史”。有一天一个和我经常来往的学生跑来问我:“老师,有一个作家叫金庸,你知道吗?”我确实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于是这位学生半开玩笑、半挑战性地对我说:“你不读金庸的作品,你就不能说完全了解了现代文学。”他并且告诉我,几乎全班同学(特别是男同学)都迷上了金庸,轮流到海淀一个书摊用高价租金庸小说看,而且一致公认,金庸的作品比我在课堂上介绍的许多现代作品要有意思得多。这是第一次有

人(而且是我的学生)向我提出金庸这样一个像我这样的专业研究者都不知道的作家的文学史地位问题,我确实大吃了一惊……

类似的情况我也同样遇到过,而且还不止一次。“既然那么多年轻人都喜欢读,做老师的完全不了解似乎说不过去。”怀着这种心情,于是我试读了《射雕英雄传》,一读之后,竟然就放不下来。1991年我在旧金山时,又有青年朋友鼓动我为当地一个华文文化中心讲讲自己对金庸小说的看法(陆铿先生曾在《百姓》杂志上为此发了专文报道)。所以,我之阅读、思考乃至研究金庸小说,可以说都在青年朋友的推动、督促之下,后来竟至渐渐觉得不为他们做点事就欠了感情的债,就会有重压之感,觉得不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程,既有愧于文学史研究者的责任,也辜负了年轻朋友的期待。

至于文界个别人士的无端指责,那是发生在1994年初冬的事。此年10月25日,北京大学鉴于查良镛(金庸)先生在法学(包括香港基本法起草工作)、新闻事业、小说创作等方面的成就和贡献,授予他名誉教授称号,我也在这一仪式上发表了题为“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的贺辞。不料,此举遭到了一位杂文界朋友的刻意嘲讽和谴责,他在1994年12月2日出版的广州《南方周末》上,刊发了《拒绝金庸》一文,说他虽然没有读过金庸小说,却知道武侠小说“有如鸦片,使人在兴奋中滑向孱弱”,说北大授予金庸名誉教授称号是“北大自贬身份而媚俗”。这立即使我想起“五四”时期北京大学开设元曲研究课程^①竟受到上海文人攻击一事。周作人曾在1930年写的《北大的支路》一文中说:

北大的学风仿佛有点迂阔似的,有些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气概,肯冒险却并不想获益,这在从前的文学革命、“五四运动”上面都可看出,而民六以来计划沟通文理,注重学理的研究,开辟学术的领土,尤其表示得明白。别方面的事我不大清楚,只就文科一方面来说,北大的添设德、法、俄、日各文学系,创办研究所,实在是很有意义,值得注意的事。有好些事情随后看来并不觉得什么稀奇,但在发起的当时却很不容易,

^① 1917、1918年吴梅在北大国文系开设“词曲”和宋元以来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两门课程,前者讲到元代散曲,后者讲到元代杂剧。

很需要些明智与勇敢,例如十多年前在大家只知道尊重英文的时代加添德、法文,只承认诗赋策论是国文学的时代讲授词曲,——我还记得有上海的大报曾经痛骂过北大,因为是讲元曲的缘故,可是后来各大学都有这一课了,骂的人也就不再骂,大约是渐渐看惯了吧。

周作人在文中表示:“我希望北大的这种精神能够继续发挥下去。”其实,这种精神也就是鲁迅所称赞的“北大的校格”:“常为新的、改进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我观北大》)北大今日对金庸的推重,犹如“五四”当年推重元曲、推重歌谣一样,都是开风气之先,同样体现了这种一贯的精神。在美国教中国文学的华人教授陈世骧,三十年前就曾直接将金庸小说比作元曲,他在致金庸的信中说:

弟尝以为其精英之出,可与元剧之异军突起相比。既表天才,亦关世运。所不同者今世犹只见此一人而已。此意亟与同学析言之,使深为考索,不徒以消闲为事。谈及鉴赏,亦借先贤论元剧之名言立意,即王静安先生所谓“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于意境王先生复定其义曰,“写情则沁人心脾,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出其口”。此语非泛泛,宜与其他任何小说比而验之,即传统名作亦非常见,而见于武侠中为尤难。盖武侠中情、景、述事必以离奇为本,能不使之滥易,而复能沁心在目,如出其口,非才远识博而意高超者不办矣。艺术天才,在不断克服文类与材料之困难,金庸小说之大成,此予所以折服也。

当初北大开设元曲的课就受到攻击,如今推重被陈世骧教授比作如“元剧异军突起”的金庸小说,又复受到讥嘲,这真使人感叹历史仿佛就是转圈,在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何其艰难!但正因为如此,我也就不自量力,决心将金庸小说搬上讲台,让大家来共同讨论和鉴别,顾不得这一做法是否妥善或超前了。

这部书稿,只是写了我读金庸小说后若干突出的感受、心得以及连带引发的许多想法,内容并不全面,论点也未必成熟。要论金庸小说的艺术成就,本应首先对他创造的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作出研究,我却并未专门论列。所以如此,除时间、精力所限外,一则因为此前已经出版过一批这样的著作(如倪匡《人物榜》,吴霭仪《金庸小说的男子》、《金庸小说的女子》,

曹正文《金庸笔下的一百〇八将》),二则因为我从各种角度探讨金庸小说时,仍要涉及书中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不专门论述,反而能避免重复。当然,今后如果主客观条件许可,我还想就金庸创作的若干方面(如金著艺术想象的特点,金著对中国传统小说形式和语言的传承与创新等),继续做点研究,以完整地了却自己的心愿。

应该说明的是:尽管我接触的“金学”或研究武侠小说的著作有限,却仍然从自己读到的一些学者、作家(如香港的刘绍铭、倪匡、吴靄仪、杨兴安,内地的冯其庸、章培恒、陈平原、陈墨)的论文、著作中获得许多教益。即使有些看法与我并不一致,同样启发我去思考。我要在此向诸位先生、女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如果说这部书稿尚有可取之处,可能在于它思考、探讨了其他学者尚未涉猎或来不及充分展开的问题,并将这些思考加以学理化、系统化而已。

最后交代一下附录的几篇文章。《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发表于1994年12月香港《明报月刊》,文内小标题亦系该刊编者所加,本人至今对全文论点见解毫无悔改之意,而且相信,如果广大读者读读这篇文章并对照相关文字,定能判断当年媒体的炒作以及由此引发的批评实在是多么轻浮和不负责任。《金庸问答录》是我1993年3月访问金庸先生所作的提问与回答的记录;《新世纪思想文化之光》是我为新近出版的金庸、池田大作对谈录《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所作的书评;两文中都保留了若干有关金庸生平、思想、创作的重要资料,对了解金庸其人、其文会有帮助。《连城诀 简评》意在消除某些读者有关金庸这部小说主旨的误解。笔者相信这些文字对“金庸迷”或有志于研究金庸小说者也会有一些参考价值。

是为序。

1998年9月20日

金庸热：一种奇异的阅读现象

读者数以亿计——持续时间之长——覆盖地域之广——读者文化跨度之大——超乎政治分歧之上——中国内地最早的读者可能是谁——一系列难以索解之谜

若问当今华文作家中拥有读者最多的是谁，大概人们会异口同声地回答：“金庸！”

金庸作品造就了千千万万个“迷”，也带来了许许多多“谜”。

金庸小说最初发表在报纸上，就已拥有大量读者。自出版 36 册一套的单行本以来，到 1994 年止，正式印行的已达 4000 万套以上。如果一册书有五人读过，那么读者就达两亿。必须注意的是，金庸小说无论在台湾还是在中国内地，都有许多盗印本。这些盗印本的总数，可能不在正式出版数以下。据《远东经济评论》“文艺和社会”栏目的资深编辑西蒙·埃利根所作的粗略估算，光是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这三大市场，历年来金庸小说的销售量，连同非法盗印的在内，累计已达一亿^①。所以，金庸小说的实际读者，很可能比上面的数字还要多出一倍至几倍。

1991 年我曾在斯坦福大学的东亚图书馆作过一点调查。他们馆藏的金庸小说，几乎都借出过几十次、上百次，“借书日期”、“还书日期”栏内盖的戳子密密麻麻。许多书都已被翻看得陈旧破烂。图书馆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已买过两种版本的金庸小说，结果都相似，因为借阅的人实在太多。

我曾经以为男性青年学生才喜欢金庸小说。谁知一调查，出入非常大，许多女学生照样爱读。而且他们的父母亲和许多上了年纪的华人也同样喜

^① 转引自张琦：《金庸在西方》，载 1997 年 1 月 28 日《文艺报》。

欢读。真是到了不分性别、不分年龄的地步！

“金庸热”之所以构成一种奇异的、令人瞩目的阅读现象，不仅由于拥有读者之多，还因为它具有下述四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持续时间长。文学作品的“热”，通常能保持两三年就算不错。而金庸则不同。《射雕英雄传》1950年代在报上连载，许多人争相传告，报纸发行量一下子增加很多。从那时起，可以说港澳地区就出现了“金庸热”。而且随着《神雕侠侣》、《天龙八部》、《笑傲江湖》等作品出现，“金庸热”四十年来竟是长盛不衰。人们可能还记得1994年10月25日金庸被授予北京大学“名誉教授”称号，并作两次讲演时的盛况，听他讲演的，请他签名的，真是到了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所发入场券几乎无用的地步，当时主持会的郝斌副校长打趣说：“今天这形势，金大侠武功再高也不好办了！”据我所知，仅1998年，就有三个金庸小说研讨会在美国、中国内地和台湾分别举行，以至有人说当年是“金庸年”。这实在就是他直到今天仍受读者热情欢迎的一个缩影。

二是覆盖地域广。宋代柳永的词曾被人争相传诵，当时流传一句话：有井水处就有人会唱柳词。今天是“地球村”的时代，金庸小说流传之广，远非柳永可比。他的读者不但在台湾海峡两岸和东亚地区，而且延伸到了北美、欧洲、大洋洲的华人社会，可以说全世界有华人处就有金庸小说的流传。1991年我到新加坡参加国际汉学会议，坐在出租车上，听到的就是《鹿鼎记》的华语广播。我还看到过一个材料，说1970年代初越南国会议员们吵架，一个骂对方“是搞阴谋诡计的左冷禅”，对方就回骂说：“你才是虚伪阴狠的岳不群。”可见连《笑傲江湖》里这些人物在当时的越南也几乎到了人所共知的地步。据韩国学生告诉我，金庸小说在韩国早有译本，并且相当风行。而近年，日本最大的出版机构德间书店也向作者买了版权，要将金庸作品全部译成日文，其中《书剑恩仇录》日译本四册已全部出版，其余的正在紧张的翻译之中。就在1998年11月，越南的两家出版社（一为文学出版社，一为社会科学出版社）都争着要求翻译出版金庸全部小说。至于英文翻译可能相当困难，但也有人在尝试，早先有一本《雪山飞狐》，而近年，《鹿鼎记》的英文节译本亦已出版。由此看来，今天“金庸热”或许又可能超出华人世界的范围。

三是读者文化跨度很大。金庸小说不但广大市民、青年学生和有点文化的农民喜欢读,而且连许多文化程度很高的专业人员、政府官员、大学教授、科学院院士都爱读。像中国已故数学大师华罗庚,美国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以及著名数学家陈省身,我熟识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黄崑、甘子钊、王选等,都是“金庸迷”。如果说上述读者还可能只是业余阅读用以消遣的话,那么,一些专门研究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教授、专家们就不一样了,他们应该说有很高的文学鉴赏眼光和专业水准,而恰恰是他们,也同样很有兴趣去读金庸小说。据我所知,像美国著名学者陈世骧、夏济安、夏志清、余英时、李欧梵、刘绍铭,像中国著名文学研究家程千帆、冯其庸、章培恒、刘再复、钱理群、陈平原等,也都给予金庸小说很高评价。据香港教授林以亮说,夏济安生前非常喜欢看武侠小说,并且认为武侠小说的创作大有可为,夏自己就跃跃欲试。后来,在台湾,有人给他看了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他就给林以亮写信说:“真命天子已经出现,我只好到扶余国去了。”^①可见夏济安对金庸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记得1994年底,我遇到女作家宗璞,她抓住我就问:“你们开金庸的会,怎么不找我呀?”我说:“听说您前一段身体不太好?”她说:“我前一段时间住在医院,就看了好多金庸的书,《笑傲江湖》啦,《天龙八部》啦,我觉得他写得真好,我们一些作家写不出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冯牧生前曾表示很愿意像对待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一样,来参加金庸小说的点评。作家李陀则用他特有的语言说:“中国人如果不喜欢金庸,就是神经有毛病。”^②这就不但是雅俗共赏,而且是科学家、文学家齐声同赞了。

四是超越政治思想的分野。金庸迷中有各种政治观点的人物,既有思想激进的,也有思想保守的;既有左派、中间派,也有右派。甚至海峡两岸政治上对立得很厉害的人,国共两党人士,平时谈不拢,对金庸小说却很一致,都爱读。邓小平先生可能是内地最早接触金庸作品的读者之一,据他夫人卓琳女士说,邓先生在1970年代后期自江西返回北京,就托人从境外买到

^① 林以亮说的这个故事,见陆离《金庸访问记》,时为1969年8月22日。这篇访问记收入《诸子百家看金庸》(五),香港明窗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30—31页。

^② 引自刘再复《我身边的金庸迷们》一文,载香港《明报月刊》1994年12月号。

一套金庸小说,很喜欢读。1981年7月18日上午,邓小平接见金庸时,第一句话就是:“你的小说我是读了的。”而据台湾新闻界人士透露:蒋经国先生生前也很爱读金庸作品,他的床头经常放着一套金庸小说。这样一种完全超越了政治分歧的阅读现象,难道不值得人们思考和研究?

除读者阅读状况非常值得注意之外,金庸小说本身还包含着一系列难以索解的有趣现象。举例说,金庸小说虽然产生在香港商业化环境中,却没有旧式武侠小说那种低级趣味和粗俗气息。再例如,金庸自己完全不会武功,却能把武林人物的打斗写得那么吸引人;金庸小说明明是武侠小说,却又有着浓重的文化气息,简直可以当做文化小说来读。又例如,武侠小说一般都以神奇、曲折来吸引人,可是金庸小说同时却又相当贴近生活、贴近人生,简直是相当生活化的,武侠小说在类型划分上无疑属于通俗文学,但如果有谁真要将金庸小说单纯归入通俗类,我敢肯定会有许许多多读者站出来强烈反对。诸如此类,金庸小说似乎充满了许多不易诠释之谜。

20世纪本是科学昌盛的世纪;中国新文学经过“五四”之后八十年的发展,也早已取得了绝对的优势。恰恰在这个世纪的后半期,金庸以传统形式写成的武侠小说出现了,并且如此长久地风靡不衰,这本身又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更大的谜。

上述种种现象,每一项都可能潜藏着有待发掘的丰厚内涵,足以发人深省,启迪人们去思考和研究。科学地揭示现象背后的诸多原因,深入地探讨金庸作品魅力之所在,解开谜底,把金庸小说放到中国文学发展的背景上加以考察,从而衡定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正是金庸研究者们共同面对的课题和任务。

文化生态平衡与武侠小说命运

评估侠文化问题的两种偏向——侠义行为：必要的社会调节机制——“五四”文学革命的局限与后来的左倾幼稚病——文化生态平衡受破坏与侠义精神的失落——武侠小说性质、功能的辨析——杨沫与鲁迅、老舍、台静农的例证——旧武侠小说的疾患与金庸等新派武侠小说的功绩

事情要从远一点的地方说起。

在中国,小说曾长期被视为“小道”。而武侠小说在一些人心目中,则大概又是“小道”中的“小道”,是小说家族里“出身不好”的一支。且不说清末已被人称作“遗武侠之模范”^①的《水浒传》在历史上曾一再遭禁;直到今天,当金庸已成为全世界华文文学中拥有读者最多的一位作家,赢得巨大声誉之际,也还有人因为他写的是武侠小说而要论一番门第出身,查他的八代祖宗,用侠士先世曾“以武犯禁”,小说本身又贩卖“精神鸦片”来加以谴责,警告人们坚决“拒绝”(刊登在《南方周末》1994年12月2日的鄢烈山先生这篇文章,题目就叫《拒绝金庸》)——虽然这位作者自谓并未读过一本金庸的

^① 见1905年出版的《新小说》第15号《小说丛话》定一论《水浒》文,其中说:“《水浒》一书为中国小说中铮铮者,遗武侠之模范,使社会受其余赐,实施耐庵之功也。”